

自由主義在台灣의 成長 及其問題



一 當代台灣自由主義的分裂與社會改革政治的挫敗

一如全球化議題所呈現出來的全球與在地間的辯證關係，台灣自由主義的經驗是這一巨大潮流下的地方回應。對台灣而言，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社會福利都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新事物，並與多重殖民的歷史經驗無法分離。建構台灣自由主義的記憶和想像，不僅提供我們面對全球化情境的問題診斷資源，也藉由理論的分析與想像，開闢未來的新視野。理解當前台灣社會政策的失敗與社會改革政治的挫敗，自由主義的世界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反過來說，社會改革的自我更新能力與限制，也將範定自由主義再成長的力道與方向。

台灣自由主義的發展有着雙元的傳統，分別是日據時期台灣本土發展出民族主義濃厚的民主傳統，以及來自戰後中國、力主反獨裁的政治自由傳統。而當代台灣政治意識有着雙層的分裂：底層是自由和民主的對立；表層卻是盤據着經濟成長對社會福利，以及民族認同對民主自決這兩組意識形態。

台灣自由主義的廣義發展有着雙元的傳統，當代的處境則深受這傳統內部自我決裂的影響。從1920年代(日據時期)台灣本土發展出民族主義濃厚的民主傳統，而來自戰後中國的自由傳統則力主反獨裁的政治自由概念。「二二八」象徵前者的潰敗和地下化，及後者的進入替代。1960年《自由中國》案則是一項功敗垂成的自由和民主合作嘗試。雖然我們無法說兩者曾在《大學雜誌》改組(1971)中匯集過，但《大學雜誌》的解組(1975)，卻有了自由(洋派)和民主(土派)關係的複雜化和路線分裂。

延續而來，當代台灣政治意識有着雙層的分裂。底層是自由和民主的對立；然而表層看到的卻是兩組意識形態上的盤據：經濟成長對社會福利，以及民族認同對民主自決。當代台灣自由主義內部對這些議題有立場上重大的決裂。雖然四個次議題間可以有更複雜的關係組合和對立，簡化的說，1975年後《中國論壇》以及短暫的台灣政論開始表面化了這兩組對立。之後的1990年代，則是有澄社沿着前者而鬧分裂，而「台社」(《台灣社會研究》)也曾陷在人民民主和(中國)民族主義間，難有妥善的解答(自由主義在台灣の成長和挑戰，請參右頁附表)。

這種理念意識上的自我分裂，加上解嚴(1987)後各種社會運動和言論思潮的蓬勃開放，嚴重地挫折了台灣自由主義的社會領導力量。特別是在面對全球化問

題叢結時所遭遇到的顧此失彼與矛盾衝突，反而還不如當代儒家從(社群式)公民德行論述與父權保守主義的互補主張，更有效地影響到社會政策的思考邏輯。即使西方國家也頻頻向東考察這(有助於)生產主義式的社會福利模式。另一方面，後現代消費主義文化和媒體市場對社會秩序與個人自我認同的顛覆，以及強化族群認同差異的多元文化主義，都讓社會福利所必須倚賴的全民團結意識四分五裂。如果台灣的自由主義不能有效地在其多元的普遍主義基礎上，建立正當的社會政

自由主義在台灣의 成長和挑戰

發展階段	問題關懷			
	民主憲政與 基本人權	民族主義和 統獨論戰	社會福利與 經濟發展(左/右)	現代性和中西文化 論戰
1947「二二八」事件				
自由中國 1949-1960 新儒家的民主評論	反專制、主張言論 自由和保障人權	反國家專制但中國 中心：未意識到民 族主義對民主法治 的諸多限制	費邊社的經濟平等 看法讓位給海耶克 的經濟自由	全盤否定(殷海光 晚年期待道德重整 來平衡民主科學)
1960自由中國案				
文星 1962-1965 中華雜誌	反專制、主張言論 自由和保障人權	反傳統卻仍是中國 中心。	無	儒家傳統文化對現 代化造成阻礙的反 傳統態度
大學雜誌 1971-1973 (除洋和土派，還 分裂出民族主義、 社會主義，進入多 元思想年代)	中央民代全面改 選、基本人權、校 園民主和地方自治 選舉	革新保台；土派和 洋派的分裂	促進經濟發展(對 經濟自由的含混)、 照顧農工福利、實 施教育改革和社會 福利	少談(可能產生混 淆的是土派但非中 國中心vs.洋派但 中國中心)
中國論壇(洋/自 由) 1975-1990 台灣政論：土/民 主派	廢除戒嚴、選罷 法、審檢分隸、考 試用人制度	台灣意識和中國意 識的分裂	經濟現代化和社會 (福利)現代化	以民主政治來接合 儒家道德；排除內 聖外王政治
1979美麗島事件 1987解嚴(1991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澄社 1989- 台社	反軍人組閣、廢除 臨時條款、解構 黨國資本主義： 民主/自由政治的 裂痕	統/獨分裂：自由 主義和民族主義關 係的反思(多元文 化主義)vs(殖民/ 反殖民的文化問 題)	用社會正義來平衡 經濟自由(羅爾斯 面對海耶克)	從反道德主義的心 靈改革到要求建 立公民社會：接受 公/私二分到現代 性—普遍主義的文 化危機
2000政黨輪替				

資料來源：除楷體字外，皆整理自江宜樺：〈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與困境〉(殷海光學術基金會主辦「自由、平等與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9)。

說明：[團體名稱]標明同時期立場不同的主要團體

治秩序，重新安置個人的生存與認同，另一階段的全面挫敗勢將到臨。類似西方兩次大戰其間發生的巨變，依舊是自由主義成長過程中不可遺忘的教訓。

二 處在全球化年代中的台灣社會政策與社會政治

當前由於利潤導向資本的向外快速流動，和日增的失業、貧窮與不平等這三位一體的惡，勢必令東亞經濟奇蹟模範生——台灣(連同其他環伺中國的亞洲工業經濟國)逐步陷入技窮的沼澤。群眾也因而對政府施政能力產生不信任和危機感。於是在反對黨的引導下，新政府被迫回到過去國民黨所長期倚賴的「經濟發展」老路，即使全球化已經結束了過去那種能夠帶來就業機會和提高收入的發展模式，並日漸轉向一種只有成長不再有重分配和就業機會的全球經濟競爭模式。除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真的幾近被停擺，「知識經濟」成為宣布「經濟優先，社福暫緩」原則後的第一訴求。

2000年的民主政權轉移表面上似乎很成功，但在永續經濟和社會福利層面卻不斷遭受抵制和挫敗。新政府的社會福利和勞動政策被在野聯盟形容為阻礙經濟成長的罪首。新政府被迫回到國民黨過去長期倚賴的「經濟發展」老路，各種社會福利政策幾近停擺，這勢必使現有社會保障嚴重不足下的經濟情勢更形惡化。

無論是訴諸懷舊的經濟發展主義，還是運用新穎的「知識經濟」概念，新政府放棄社會福利來成就經濟的策略，勢必使現有社會保障嚴重不足下的經濟情勢更形惡化。特別是倚賴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知識經濟，不僅已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況更加嚴重，彈性化低技術勞動力造成的，不僅將是「有工作窮人」的增加，更在利潤邏輯推動「外勞化」的勞動趨勢中，讓不同年齡層、不同技術層和產業部門的受僱勞動人口，都可能成為長期失業和因此陷入貧窮人口的基本構成。在全球化脈絡中，「知識經濟」既無法替代社會福利的保障作用，也不可能帶來另一次經濟成長和分配平均共生的奇蹟。造成這一雙輪局面的，正是「經濟優先，社福暫緩」的不當邏輯。

於是，公元2000年的民主政權轉移表面上似乎很成功，但在永續經濟和社會福利層面卻不斷遭受抵制和挫敗。反福利的「經濟發展論／全球競爭論」者和政治上的「法統派」，成功地跨界組成了對抗新政府「台灣主體」和「全民福利」導向的最佳拍檔。台灣社會不但沒有適當地回應全球化所帶有的可能轉型契機，反倒是伴隨的困境因此加深。新政府務實地尋求妥協的能力，一等地經由經濟利益逼迫公共利益，而蛻變成政策善變和政治投機的根源。民主政治已逐步喪失了對市場經濟的公共節制能力。連同核四案，新政府的社會福利和勞動政策被主導立法部門的在野聯盟形容為阻礙經濟成長和削弱競爭力的罪首。被外流資本遺棄的股票族和房地產族，在此被反對勢力動員為可資利用的重要資源。而原本就居弱勢的勞動階級，卻在這些發展下更加的自我分裂：除了資訊／知識社會兩極化的勞動市場外，在統獨衝突的加溫和全球競爭的失業威脅下，形成更分歧的行動策略。在這諸多層面上，全球化的競爭要求被簡單地解讀為就是「靠攏中國」，進而陷入一種從政治跨界到經濟的自我邊陲化。過去曾有效用來對抗或平衡統派訴求的「戒急用忍」論述，在朝野易位後反被拋開以求策略性的政治結盟。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的混為一體，如2001年8月「經發會」達成「一個市場的中國」共識，已完全誤導了我們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以及民主政治與民族主義的歷史關係，及其在當代可能的新關聯模式。

三 社會福利與自由主義的背景和前景

在這問題中，糾纏的有自由憲政、民主政治、社會福利、民族團結以及它們個別或聯合對現代(專業)官僚行政國家間的複雜關係。潛藏在這複雜現象背後的，則是個人自由與自由主義的歷史成長與當代發展問題。在這裏還須指出的是，此乃相當普遍的全球性趨勢，而不只是台灣社會在邁向自由民主福利國家過程中所特有的孤立困境，即使複雜度有別：特有的統獨政治衝突造成我們對自由民主的曖昧解釋，對社會福利與公民資格認定的分歧，還有對增進經濟競爭力策略選擇的對峙。理解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構成與過程，及其在台灣的擴散和成長，可以幫助我們面對全球化挑戰和挖掘其增進自由的潛能。對於全球化所突顯出來的種種困惑與矛盾，如財富累積和貧窮惡化的兩極發展，自由的個體和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民主自治與民族認同的決裂，社會改革和文化政治間的矛盾等，也只有在這歷史對照中得到啟發。

從十七八世紀古典自由主義的發展開始，個人自由的問題、增進福祉後果的價值和法治憲政的架構已逐步在民主自治、民族主義和社會福利的相繼挑戰下，改變並多樣化了自由主義本身的形式：由古典的、效益的、社群／社會／進步的、福利／平等主義的，到當前市場至上的「嶄新的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強調純粹政治的「政治的自由主義」，還有那後現代式的「文化超自由主義」。從社會政治的發展軌迹來說，如果戰後工業民主國中的凱恩斯主義福利政策體制是自由對民主、民族、社會理念的歷史性調和，那麼我們將發覺全球化的趨勢，威脅着這一調和基礎的蝕毀和瓦解，以及社會改革政治的衰退。

歷史性調和瓦解的現實是否不可能且不應該挽回？透過對自由市場無法脫離社會基礎再生產的一種相互依賴關係(否則造成一種過度成功導致的自毀)說明，我們發現嶄新自由主義的文化霸權和基本教義派宣稱，仍會不斷地面對來自民主、民族和社會力量的單獨或聯合挑戰。在(經濟／政治)自由主義面對(社會)自由主義本身的競爭中，社會福利和自由主義的歷史關聯，提供我們檢視人性價值和自由目的的相互構成關係。與其(經濟或文化)採取放任主義地放棄或是批判歷史調和的可能與價值，我們認為如何尋求和想像一個新的歷史調和，才是當前自由主義發展的動力和挑戰方向。自由主義的前景，一如其展現出來的歷史多重面貌，有賴於我們從這些盤根錯節的難題中，特別是現代社會政治的自我宰制和放任主義經濟文化複雜體的社會自我蝕毀力量間，找尋到調和衝突價值和克服兩難困境的有效機制。

如果戰後工業民主國中的凱恩斯主義福利政策體制是自由對民主、民族、社會理念的歷史性調和，那麼我們將發覺全球化的趨勢，威脅着這一調和基礎的蝕毀和瓦解，以及社會改革政治的衰退。如何尋求和想像一個新的歷史調和，是當前自由主義發展的動力和挑戰方向。

四 自由主義面對自由主義

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和現代性有着緊密關聯。回應着社會經濟變遷，我們可以察覺到自由主義發展的辯證走向：除了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反覆，當代更增添了放任主義與平等主義間的複雜面向。來自左、右政治所激進化的當代放

任主義，分別帶動了文化和經濟領域的重大轉變，並脫離了先前西方現代性發展的共同束縛。特別是那十九世紀下半以「社會(的)政治」為名所發展出來的社會福利理性官僚行政國家。為了因應這一挑戰，甚至也帶來了社會和政治領域自我重建時的策略分裂與對峙。前者有社群主義、市民社會理論和結社主義，後者有政治自由主義和公民的共和主義，以及在多元主義架構下尋求理性共識的審議民主理論。我們的分析將闡述分離路線的嚴重弱點，同時論證只有以社會理論為基礎的政治重建，才能提供一有力的出路，並在多層次治理的架構上，重新打開世界主義理想政治的可能。

社群主義等質疑福利國家政治權力對社會有意義生活的干預，造就了個人生命的孤立和空洞。但是與政治分離的自願結社和社會參與活動，並不能確保特殊連帶的結社組織是在或可以促進公共目標和養成公民德性，一如我們在經驗中所常面臨的非營利組織或志願工作者「真相」。這問題困擾着結社主義的同情者，也警覺地提出如黑格爾(G. W. F. Hegel)般的倫理國家來節制這一社會淪落的可能。政治的自由主義，有時連同(公民的)共和主義，則反向地要以「去社會化」的策略，來避免私人利益對政治公共領域的滲透和扭曲。雖然公民的共和主義要以公共意志來限制個人私利，政治自由主義則反而要限制公共理性的用途，來維持個人自由的一定空間和多元價值的容忍精神。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審議民主則強調自願結社和社會參與的教育功能和自我轉變力量，而溝通性自我的概念提供了程序性對話倫理和審議民主概念一社會性的實質基礎，並可透過市民社會結社主義來達成自我和他者在不同治理層次與組織間的相互承認與生活聯繫。

立基於溝通理性邏輯的審議民主政治，也會有助於疏解當代人類權利與公民地位間的嚴重裂縫。那是一個產生自現代福利國家危機中，利益如何重新分配的正當性問題。就在爭議社會福利保障和服務提供時，福利國家所倚賴的公民社會權利理論，分別遭受到來自個人權利和公民德性論述的攻擊。結果，我們看到的是以普世／自然的人類權利和以特殊／共同體的公民德性這兩種理論策略，來重新建構理論性的視野和尋求社會政策模式的更新。在仍負有重責大任的國家政治上，溝通性的自我提供了一重要的中介性角色和民主的學習機制：不僅重視個人法治權和社會給付資格權利相互間對維護自由的功能，也在集體認同和政治成員身份間闡述了相互構成性的重要聯繫。在超越國界的國際政治上，亦隨着全球化而有多重身份公民意識的發展和全球公民社會的浮現，進而促成了社會與個人間多層次緊張的辯證性調和，和團結性個人主義成長的新契機。

在這意義上，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社會理論重建，再度打開審議民主和世界主義政治的可能。同時這樣的社會理論可以重新和文化多樣性與特殊性進行多層次的對話，而無須陷入無法自拔的相對主義或基本教義主張中。審議民主和世界主義政治所形成的公共規範力量，則提供目前狂放無拘束自由市場經濟一多層次治理的管制架構。經濟全球化所構成的一國社會平等與全球正義間的兩難問題，只能在這多層次治理架構下，來從事協商和獲致相互的節制。然而這並不是一個「歷史的終結」或「戰後福利共識」的複製品。這樣的理論建構並不能夠直接地導出每個(理性的)人都必須遵守的原則，並總是要不斷地面對人們非

社群主義等質疑福利國家政治權力對社會有意義生活的干預，造就了個人生命的孤立和空洞。但是與政治分離的自願結社和社會參與活動，並不能確保特殊連帶的結社組織是在或可以促進公共目標和養成公民德性。這問題困擾着結社主義的同情者，也警覺地提出如黑格爾般的倫理國家來節制這一社會淪落的可能。

理性力量的挑戰、承認或學習接受而後產生有效拘束的規範性力量。這非理性的「他者」是讓理性產生自省力量的來源，而不只是對反和必須被克制的破壞力量。這一不斷向界線挑戰的力量，是在對話倫理的規範性引導和限制下，在秩序中尋求對他者的承認、平等的尊重、相互學習和共識的多樣性擴張。

五 面對自由主義的「全球困局」： 零和遊戲的現實與雙贏策略的想像

台灣自由主義的社會困局是全球的一部分，因此不是一國之內就可以自行解套，但也無法有直接移植的處方。社會與福利自由主義所辯護的福利國家，在戰後成功產生的後果是社會需要的膨脹，但支持的人口與財務萎縮，社會團結基石則遭到文化解構。對總體經濟發展的政治調控手段，又在冷戰所帶動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逐步見絀，加深了社會風險的普及化。內外因素的先後與交錯作用，呈現出一種新的零和遊戲現實：在一國之內，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處於相互抵銷的零和關係；在國際之間，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平等和全球正義間的魚與熊掌難以兼得。台灣的特別困難則因中國民族主義和自由市場論述的合意，表面化了自由主義的多重分裂意識。縱使要倚賴跨國多層次民主治理結構合作的全球社會政策，也無法輕易的擺脫民族主義的糾纏。

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中，有着各種勞工激烈抗議的活動。對美式自由貿易者而言，先進工業國家的勞工保護主義，將損害第三世界國家勞工的工作機會並不利於貧窮的減緩。歐陸的社會傾銷論述則反向指出，以廉價勞力作為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唯一道路，不僅危及先進工業國家的勞工權益和既有社會安全，也會因為國家間競相提供游動資本更多優惠待遇和放鬆管制，造成一種向下旋轉的共同沉淪。這種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邏輯不但會嚴重損害先進和新興工業國家勞工權益，而且未必可以確保全球（重分配）正義的實現。博蘭尼（Karl Polanyi）《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曾分析英國工資補貼制對社會和人格的高度破壞性，而這樣的潛在威脅正隱藏在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場經濟機制中。一個「市場的中國」論述無視於這樣的危險，要迫使我們接受一種中國管道的全球化。

這裏，我們相當程度地混淆了事實和命運的根本不同，自囿於短期物質利益和文化一統的偽裝，選擇放棄烏托邦地重建為一種可以調和為個人、社會／國家與全球三贏的遊戲。我們期待在社會、經濟、政治、以至文化的自由主義間的對話與溝通，不僅能產生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也能透過成熟民主對話的力量，來對台灣當前的民主與族群問題，以及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平衡的議題，起着制度學習和創造轉化的作用。

對美式自由貿易者而言，先進工業國家的勞工保護主義，將損害第三世界國家勞工的工作機會並不利於貧窮的減緩。歐陸的社會傾銷論述則反向指出，以廉價勞力作為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唯一道路，不僅危及先進工業國家的勞工權益和既有社會安全，也會因為國家間競相提供游動資本更多優惠待遇和管制，造成一種向下旋轉的共同沉淪。